

王華寶 著

《史記》金陵書局本與點校本校勘研究

鳳凰出版社

王華寶 著

《史記》金陵書局本與點校本校勘研究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史記》金陵書局本與點校本校勘研究 / 王華寶著.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506-2969-1

I. ①史… II. ①王… III. ①《史記》—校勘—研究
IV. ①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125357號

書名	《史記》金陵書局本與點校本校勘研究
著者	王華寶
責任編輯	郭馨馨
裝幀設計	徐 慧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	揚州皓宇圖文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食品工業園連心路68號,郵編:225002
開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張	22.5
字數	357千字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969-1
定價	78.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4-8782526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3YJA770032）

東南大學中央高校『雙一流』學科建設資助項目

目 錄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的對象與目標	1
第二節 《史記》校勘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7
第三節 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45
第四節 研究的價值與創新點	52
第一章 《史記》局本與《校刊史記札記》	58
第一節 《史記》局本的形成	58
第二節 《史記》局本對點校本、修訂本的影響	69
第三節 《校刊史記札記》的形成與主要內容	74
第二章 《史記》點校本與局本對校研究	85
第一節 點校本校改理據匯考	85
第二節 關於古籍整理規範	196
第三節 點校本排印錯誤	207
第三章 《史記》點校本與《校刊史記札記》對校研究	233
第一節 點校本與校刊史記《札記》關係的基本判斷	233
第二節 點校本對校刊史記《札記》具體采擇的研究	235
第四章 《史記》點校本、修訂本志疑	248
第一節 《史記》點校本志疑	249
第二節 《史記》修訂本志疑	267

第三節 《史記》版本異文校勘舉隅	274
第五章 《史記》標點問題舉隅	284
第一節 標點可商之處	285
第二節 標點致誤的原因分析	295
第六章 《史記》點校本與修訂本述評	298
第一節 點校本對金陵書局本的超越	298
第二節 點校本存在的問題	303
第三節 修訂本取得的成績	315
第四節 修訂本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318
結 語	325
附錄：《應教青史留英名——點校本〈史記〉原點校者考述》	328
參考文獻	341
後 記	356

緒 論

司馬遷《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上溯黃帝，下論漢武，熔三千年歷史於一爐；以“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之語”的氣概，創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包羅萬象，匯百科性知識於一編。《史記》無愧於“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語）的美譽，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式的經典巨著，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它在史學、文學和其他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歷來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視和學術界的推崇。對於司馬遷及其《史記》的研究已歷時二千多年，一門新的學科“史記學”已形成并不斷豐富。包括《史記》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等內容的《史記》文獻學，應當是構成“史記學”的重要的基本內容。《史記》校勘研究則是《史記》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史記學”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本書即從校勘角度研讀《史記》文本，以討論傳承過程中滋生的訛誤、理解的不當為重點。

第一節 研究的對象與目標

本書主要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清同治年間（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唐仁壽^①、張文虎^②等校勘的金陵書局本《史記集解索

① 唐仁壽（1829—1876），字端甫，號鏡香，浙江海寧人。家饒於財，購書累數萬卷，多秘籍珍本。究心於六書音韻之學，喜讎校經史，藏書蕩於兵火。後為曾國藩招致金陵書局，生平所為書均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

② 張文虎（1808—1885），字孟彪，號嘯山。南匯縣周浦鎮（今屬上海）人，清後期著名學者。同治二年（1863），張文虎赴安慶入曾國藩幕。三年（1864）入金陵書局。陳大康《張文虎日記·前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說：“校勘《史記》諸書，前後長達十年。同治十二年（1873）冬，張文虎以衰老辭歸，後主講於南菁書院，卒於光緒十一年（1885），終年七十八歲。”另有《舒藝室隨筆》《續筆》《餘筆》《覆瓿集》等著述及日記四冊存世。

隱正義合刻本》(以下簡稱“局本”);二是以局本為底本的中華書局 1959 年初版、1982 年再版(上述二版簡稱“點校本”,有時分別稱述)、2013 年修訂的點校本《史記》(以下簡稱“修訂本”);三是與此二本關係極大的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以下簡稱“《校刊史記札記》”,或張文虎《札記》);四是相關的研究成果。

點校本《史記》參考明凌稚隆《史記評林》^①、清吳見思《史記論文》^②、張裕釗校刊的歸(有光)方(苞)評點本和吳汝綸的點勘本等的句讀^③,依據張文虎《札記》等,進行全新的分段、標點、校理,對部分古字、異體字進行處理^④。學術界公認其兩大特點,即“分段精善”“技術處理合理”。點校本《史記》被譽為“學術界繼唐代三家注定本以來最精善的一次整理,集千餘年來學術研究之大成的善本,在《史記》版本校勘學研究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為我國古籍整理做出了有典範意義的重要貢獻”^⑤。到 2013 年總計 54 年,據中華書局發佈的信息可知,共印行 27 次,發行近 60 萬套,還不算那些形式各異的衍生品種。修訂本至 2017 年第 4 次印刷,已發行 4.5 萬套。

然而,作為《史記》底本的清金陵書局本自身究竟據何底本,參校了哪

①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明吳興凌稚隆輯校,重要版本有明萬曆四年(1576)凌氏刊本,五年刊本;明萬曆間建陽熊氏種德堂刊本、熊氏宏遠堂刊本,雲林本立堂刊本(此三種皆為李光縉增補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清光緒十七年(1891)長沙養翻書屋校刻本;清光緒十年(1884)湖南劉鴻年翻刻本等。

② 《史記論文》一百三十卷,清康熙年間江蘇武進人吳見思(1621—1680)著,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尺木堂刊本、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桂垣書局刊本、1936 年廣益書局刊本,1986 年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版陸永品點校整理本。

③ 歸震川評點史記一百三十卷附方苞評點史記四卷,明歸有光(1507—1571)評點,有清光緒二年(1876)武昌張裕釗(1823—1894)刊本,1915 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1918 年交通圖書館石印本。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一百三十卷,清桐城吳汝綸(1840—1903)點勘,吳闓生編錄,有清宣統元年(1909)南宮邢氏刊本,清宣統二年(1910)桐城吳先生群書點勘本,1930 年南宮邢氏刊本。關於方苞,可參王振紅《方苞〈史記〉學成就述論》,載《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5 期。

④ 詳參中華書局 1959 年版《史記》的《出版說明》《點校後記》等。

⑤ 安平秋、張大可、俞樟華主編:《史記教程》,華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6 頁。

些版本，吸收了多少前人成果，與張文虎《札記》之間的關係如何，刊刻過程及現存印本之間異文現象如何解釋等問題，仍較模糊，或從未探討。點校本“二十四史”中僅《史記》沒有校勘記，據初步研究，《史記》出校改符號的近八百處改動有數十處存在爭議，全書有過百處為暗改，有三百多處屬於排印訛誤，大量的前人成果未得到充分利用，標點符號可商之處眾多。因此，圍繞《史記》局本與點校本開展系統的校勘研究，從中總結、歸納古文獻校勘所必須遵循的理論原則和科學方法，可以將《史記》文獻整理工作推向一個新的學術高度，有利於《史記》的修訂工作，體現出當代史記學研究水準，有利於其他古籍整理研究作借鑒，同時對於豐富和發展古文獻學基礎理論，特別是完善校勘學理論，都具有極重要的學術意義。

2013年《史記》修訂本問世，據《修訂前言》介紹：“修訂本仍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兼顧不同印次的文本差異。校勘所用通校本、參校本涵蓋宋元明清各個時期不同系統最具代表性的《史記》版本。”其中有“世間乙部第一善本”——中國臺灣藏北宋景祐監本《史記集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宋紹興初杭州刻本《史記集解》、日本藏南宋慶元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刊《史記集解索隱》本、日本藏六朝鈔本、日本藏唐鈔本、法藏敦煌殘卷等；全面覆核了點校本對底本所作的校改等，覆核了三家注的全部引文。其結果是，修訂本對原點校本分段進行優化、調整，改正破讀之處，統一標點體例，糾正訛脫衍倒。共改標點符號約6000處，新增校勘記3400餘條^①，處理文字約3700字（增1693字，改1241字，刪492字，移298字），改正點校本排印錯誤300多處，並且恢復了被原底本刪削的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中的《補史記序》《補史記條例》和《三皇本紀》等。《點校本〈史記〉修訂本出版》一文從“廣校諸本”“新撰校勘記三千三百餘條”“訂補疏誤，後出轉精”“尊重底本，優化完善”和“多

① 《史記》修訂本，中華書局2013年9月出版精裝本，2014年8月推出平裝本。平裝本又有一定的改動，筆者據之統計，校勘記共有3946條。

領域專家協作”五個方面分析，認為“修訂本充分地反映了時代學術的進步”^①，相對客觀。學術界與出版界對《史記》修訂本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極高的榮譽^②，也有一些討論性的意見^③，以辛德勇《史記新本校勘》影響為最大^④。

因此，追根溯源，全面探討《史記》點校本所依據的局本的得失，結合局本主事者之一張文虎所撰《校刊史記札記》，研討點校本對局本的超越、點校本存在的問題、修訂本取得的成績、修訂本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等問題，可以說是“史記學”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點校本《史記》是在特定的時代出版的，點校本未能、也不可能不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整理的指導思想、觀念、方法、材料及研究水準。^⑤

① 載《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簡報》（第80期），第5—6頁。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辦公室編，2013年10月31日。

② 該書列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2014年獲江蘇省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證書號：130016），成果署名：趙生群、方向東、王華寶（東南大學）、吳新江、王鏢、曹紅軍、王永吉、蘇芃。2014年獲“致敬國學——2014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之“國學傳播獎”。2015年獲教育部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歷史學一等獎。2017年獲首屆宋雲彬古籍整理獎。2018年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

③ 如拙稿《〈史記〉修訂本平議》，載《渭南師院學報》2014年第18期；《〈史記·八書〉校改理據研究》，載《南京師大學報》2015年第3期；《〈史記·八書〉點校本與修訂本校改理據考（一）》，載《周秉鈞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史記〉修訂本志疑十則》，載《中國訓詁學報》第三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又《史記論叢》有多篇商討性的文章。

④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⑤ 關於二十四史的整理，參加《宋史》整理的裴汝成在《心中始終裝着作者讀者》一文中說：“在校勘方面又遇到了思想認識和實際問題。當時的一個關於整理二十四史的檔上說：校勘以版本對校為主；又說：校勘要避免繁瑣考證。大家對這兩條的理解和掌握頗不相同。”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我與中華書局》，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85頁。關於《史記》的整理，謝方在《改造 定位 創業——記1950—1965年的中華書局》一文中說：“《史記》的點校原由顧頡剛負責，他因老病在身，由他的助手賀次君代做，但問題很多，金燦然很不滿意，就請宋雲彬在顧先生的基礎上重新再點。這是1959年國慶的獻禮書，所以他的工作繁重而緊迫。”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我與中華書局》，第387頁。此條資料承周助初先生惠示，特此鳴謝。宋雲彬先生的日（注轉下頁）

學術界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現代學術水準、新理論的指導、衆多新發現的資料和科技高度發達等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期獲得新的進展。同時，充分肯定《史記》點校本、修訂本分別代表着不同時代的最高的古籍整理水準，各有其歷史貢獻和文化價值。五十多年前的點校本，在今天看來存在各種不足與失誤，這是古籍整理研究事業向前發展的必然結果。在 21 世紀的今天，既承認點校本的歷史局限，又對任何筆路藍縷者都不應該提出過高的要求，不低估點校本發揮的歷史作用，還要對新修訂的校勘記、標點符號等進行客觀分析，進行合理的解釋和科學的評判。

關於校勘與校勘學的性質和功用，陳垣在《通鑑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曾說：“校勘爲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爲善學也。”先師錢玄先生認爲：“校勘，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確鑿的證據，校正古書中由於抄寫或翻刻等原因而產生的字句、篇章等錯誤。”“校勘學應該屬於文獻學的一門學科，因爲它是以古文獻爲研究對象的。它跟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都有密切的關係，校勘需要綜合運用這些學科的知識、理論來進行工作，所以校勘學是一門綜合的、應用性的學科。”^①程千帆、徐有富先生認爲：“校勘工作是從事學術研究，特別是古代典籍研究的起點。而且審慎精密的校勘成果往往可以防止和杜絕許多望文生義的無稽之談，爲獲得正確的結論準備了條件。”^②可以認爲，在現代意義上，校勘是指對某種古籍進行校讀勘定，使之復原存真，爲閱讀或研究提供一種接近作者原作的文本的學術工作。

（續上頁注）記《冷眼紅塵》也有相關記載，可參閱。關於二十四史的整理情況，已出現多篇介紹文章，如《趙守儼文存》所收趙守儼寫於 1986 年的《風風雨雨二十年——“二十四史”始末記略》（又見《回憶中華書局》，中華書局 1987 年版），《書品》1997 年第 4 期所收蔡美彪《二十四史校點緣起存件》。關於《史記》的情況，謝方爲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於 1957 年 9 月進入中華書局的首批大學生，在《史記》編輯出版時正與宋雲彬同室辦公，所言較可信。又，筆者看到一份落款爲“中華書局編輯部 1961 年 7 月”的《史記勘誤表》，稱：“我局標點本《史記》，於 1959 年 9 月發行第一版後，經檢查發現了若干標點的錯誤及錯字。除於再版時改正外，特列勘誤表，印發給持有第一版的讀者。”經統計，總共有 436 條，其中涉及文字改動的有 20 條。436 條已不算少，但仍有未見於此表的。

① 錢玄：《校勘學》，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頁。

②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齊魯書社 1998 年版，第 33 頁。

本書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通過對公認的《史記》善本金陵書局本與當今權威的《史記》版本點校本、修訂本進行較充分的考察和鑒定，探討其中存在的底本、校勘、古籍整理失範、標點等各種問題，為《史記》修訂本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議，為今後編纂《史記》新校注本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為開展全面的《史記》專書研究積累材料，為“史記學”打造更好的學術平臺；另一方面，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史記》，把握這部巨著的精神內涵。並為其他古籍整理研究做借鑒，提供研究實例，豐富和發展文獻學理論，特別是校勘學理論。研究的內容大致分為五個方面：

一、圍繞金陵書局本，探討其所據底本、參校版本、吸收前人成果、成書過程、印本差異等，以顯示其在《史記》版本史上的價值，揭示其存在的不足。如局本吸收前人成果不够全面和嚴謹，王念孫《史記雜誌》共有460餘條，局本據之改動了80多條，有許多“善而未擇”之處，點校本據王念孫說改動了近90條即是明證。又如局本在刻印過程中有不少差錯，嚴重之處脫漏文字二三十字，點校本進行暗改，據統計有近百處，掩蓋了局本的不足。

二、圍繞中華書局點校本，在肯定其學術貢獻的同時，探討其存在的底本校對不精、前人成果吸收不足、排印失誤不少、整理不够規範、標點問題不少等，提示修訂工作努力的方向。如許多改動沒有校改符號，有的文字處理不一致。並據相關史料，對顧頤剛、宋雲彬、賀次君等各自為點校本所作貢獻做一些梳理。

三、研究金陵書局本、點校本與張文虎《札記》的關係。張文虎《札記》原本專為金陵書局本《史記》而作，“說明用以互校的各本異文及去取理由”，然而二者不一致之處甚多，揭示其原因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

四、探討點校本據《校刊史記札記》校改的理據，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並探究點校本在校勘標點方面可以改進之處，揭示可以進一步整理研究的問題和提升的空間等。

五、就《史記》校勘研究對其他學科、對文獻學研究的作用等發表一點看法，如《史記》整理研究與《漢書》等其他古籍整理研究的關係，《史記》校點與語言研究，《史記》校勘與辭書編纂，《史記》校勘與出土文獻研究

等,《史記》校勘實踐對校勘學理論的豐富作用,對《史記》修訂需要注意的問題、今後需要拓展的空間等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和展望。

本書研究的主要目標是,以《史記》局本與中華書局點校本、修訂本為中心,在對《史記》重要版本、新見《史記》文獻研究資料(包括出土文獻等)、學術成果等進行全面梳理的基礎上,說清楚局本的特點及其不足;參考相關成果,揭示點校、修訂的理據,並對點校、修訂中誤校者辨正之,漏校者補正之,前人雖有卓見或致疑而未為所用者申正之;探討《史記》校勘研究的應用價值。具體目標為:

一、重新考察金陵書局本參校版本、吸收前人成果、刊刻過程與現存印本差異等,探討局本在《史記》版本研究中的地位。

二、將局本與點校本進行仔細覆校,結合點校本產生的時代背景與成書過程,古籍整理體例的確定過程,整理者與編輯、審稿者的互動等,探討點校本的不足之處。

三、對點校本所依據的主要校勘材料張文虎《札記》(近 9000 條)逐條分析,系統揭示點校本的校理理據並進行一定的考證,表明僅有近 800 處明顯改動的點校本,不能以張文虎《札記》代替作為校勘記,而應當像其他各史一樣有自己的校勘記。

四、對《史記》重要版本、新見《史記》文獻研究資料(包括出土文獻等),特別是最新的學術成果等,進行較全面的梳理,探討《史記》整理校勘過程中“善而未擇”與“所擇未善”等問題。

五、對點校本標點問題舉例分析,並嘗試探討標點致誤的原因。

本書在行文中,對於所引用的文獻,一般保留規範繁體字,涉及版本差異、校勘、標音等問題,酌情使用一些古體字、異體字。

第二節 《史記》校勘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史記》校勘研究與《史記》的流佈和版本,與古籍校勘史、古籍出版史和學術發展史等密切相關。在流佈過程中,由於傳抄、刊刻等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版本。版本的不同,就可能存在文字上的差異。我們在考察《史記》校勘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時,必然要關注《史記》的原始版本及流佈

情況，關注各個時代古籍校勘的特點等。在《史記》研究的領域中，對於《史記》校勘的研究可以說是最具基礎性和挑戰性的研究。也可以說，《史記》研究的進步是伴隨着《史記》版本校勘研究的進步而前進的。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這一基础性難題，不斷進行深入的探討，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些輝煌的成就正是今日《史記》校勘研究的新起點，因而對前代學者與時賢研究中的成就與不足，做一個較全面的回顧和總結，有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從而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開拓《史記》研究的新局面，為點校本《史記》修訂及完善工作創造條件。基於此，本節首先力圖對古代的《史記》版本特別是《史記》校勘研究做一個較系統的介紹和簡要的評述。

一、《史記》的流佈與刊刻概貌

《史記》成書之時，正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確立之際，在正統思想家眼中，《史記》有“謗書”之嫌，其流佈受到了限制^①。《太史公自序》稱“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據現代研究成果，認為“藏之名山”，指所謂正本；“副在京師”，指所謂副本。副本流佈在先，正本流佈在後。據《漢書·司馬遷傳》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漢書·楊敞傳》後附《楊惲傳》載：“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史記》先以單篇的形式流傳，自西漢末宣帝時，司馬遷外孫平通侯楊惲宣佈後，整體為世人所知，流佈民間。正副本均為後世各本之祖本。此“雙祖本”現象，似應受到高度重視。楊惲應是《史記》的第一個傳播者。

漢代桓寬《鹽鐵論·毀學》記載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為自己的“興利”政策辯護時引用《貨殖列傳》中的一些資料“司馬子言‘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以此來反對儒生們“重義輕財”的觀念，並尊稱司馬遷為“司馬子”。

^① 安平秋、張大可、俞樟華主編：《史記教程》第十一章“《史記》流傳”稱“兩漢是史記學的厄困時期”，第410頁。

楊海崢指出：“據所能看到的史料記載，最早引用《史記》的人是桑弘羊。”^①時間約在漢宣帝時代，開節括引用《史記》文章之先。

《史記》產生異本、文字歧異應該是在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等續補《史記》之後^②。袁傳璋推斷，《史記》正本“藏之名山”，傳於其女，秘存華陰，後由其甥楊惲免官家居時“宣佈”，自此民間始有《史記》抄本流播；“副在京師”，進呈御府後，不僅慘遭砍削，“十篇缺，有錄無書”，而且嚴禁外傳，唯班斡蒙賜御書之副。以後班彪在安陵評《史記》、作《後傳》，班固在洛都蘭臺奉詔撰《漢書》，皆據此副本又副本。太史公手錄的《史記》正本佚於楊惲蒙難；副本毀於王莽之亂；副本又副本亡於董卓移都。東漢流佈之一百三十篇《史記》，當係正副本兩大系統抄本配補而成，已失太史公手定正、副本舊貌^③。袁先生之論雖多推測，有待相關材料的佐證，然言之成理，可備一說。

《史記》流佈史上，亡缺與續補竄附問題，一直是聚訟紛紜的重大課題，至今無定論，有識者歸為“《史記》疑案”，張大可《史記斷限與殘缺補竄考辨》^④，趙生群《〈史記〉斷限辨疑》、《〈史記〉亡缺與續補考》等文^⑤，是當代較為重要的相關成果。班彪云：“（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後漢書·班彪傳》引《略論》）《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漢書·司馬遷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遷之自序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漢書·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父子所著《別錄》《七略》節縮而成，凡有部類調整、篇目增省，無不一一注明。據以上所引資料可知，《史記》在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已缺十篇。班彪“家有賜書”，有《太史公》秘書之副本，劉向、劉歆、班固則都曾典校秘書，他們認定《史記》十篇有錄無

① 《漢唐〈史記〉研究論稿》，齊魯書社 2003 年 6 月版，第 19 頁。

② 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商務印書館 2001 年版，第 9—13 頁。

③ 袁傳璋：《太初·麟止·於茲——〈史記〉敘事起訖與主題演變考論》，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討論會論文，2002 年 2 月於重慶。該文收入安平秋、閻崇東主編：《史記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

④ 見《蘭州大學學報》1982 年第 2 期。

⑤ 兩文均收入《〈史記〉文獻學叢稿》，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書，應屬可信。第一個列出《史記》亡書篇目的是張晏^①，他說：“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對於張晏列的十篇亡書，不少學者有不同看法。為此，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詳加考辨，證成其說，提出了不少精闢的見解，可參看。趙生群先生認為，從《史記》的版本、體例、內容三個方面綜合考察，不難知道今本《史記》雖然十篇篇目俱在，但已不是史公原作。

張晏曾說，《史記》十篇既亡，“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②。褚少孫續補篇目有明文可考者共六篇：《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褚少孫續史六篇加上補亡之作四篇，總計褚氏續補《史記》達十篇之多。趙生群先生認為，褚少孫續補《史記》，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全部標明“褚先生曰”，而且往往明言材料來源及作文目的，絕無魚目混珠之嫌。後人把沒有標明“褚先生曰”的續補文字一起歸到褚氏名下，明顯欠妥。二是褚氏續補的文字一開始就依附於《史記》而行。此外，《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之後，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據趙生群先生研究，兩漢時真正續補《史記》的，只有褚少孫、馮商二人，其他人都只是續而沒有補。

《史通·古今正史》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史通》所舉各家，除馮商外，其餘都是續載太初以後事。諸家續書多鄙俗，且零星

① 張晏，生卒年不詳，三國時魏中山人，著有《漢書音釋》四十卷，已佚。

② 《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引。《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索隱略同。

不成系統，班彪采其事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固在此基礎上撰成《漢書》，各家續書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故《漢志》均未著錄。

而與流佈相關的另一問題，即刪減問題，也應給予一定的重視。胡寶國認為：“比兩漢之際發端的經學刪減運動稍後，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刪減之風。”^①對《史記》而言，就有多次刪減。如《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史要》十卷。”注：“漢代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後漢書》卷八四《楊終傳》：“（楊終）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同卷《應奉傳》注引袁山松書說：“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衛颯、楊終、應奉等對《史記》的刪減，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對《史記》的流佈終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造成亡缺，或產生異文等。因文獻的缺失，具體的情況我們難以詳悉，但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宜有《史記》流佈過程中曾經過“刪減運動”那麼一種意識。

東漢中期以前因受到當政者的嫉恨和當時文化氛圍的限制，《史記》流傳不廣。《西京雜記》卷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班固《典引》記載漢明帝曾說：“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諛士也。”因此，當政者多方阻撓《史記》的傳播。另外，當時的文人學士，多崇尚鋪張揚厲、對偶工整、語言華麗的辭賦，不能理解《史記》自由奔放、參差不齊的散體長短句的風格，正如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序》所言：《史記》“比于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卧，良有以也。”《史記索隱後序》又言：“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採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闕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加之當時史學仍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列入《春秋》類中，未取得應有的獨立地位，種種因素都影響了《史記》的傳佈和研究，《史記》只是在上層極小的範圍內流傳。

東漢中期以後，《史記》儘管仍未獲得較高的評價和應有的重視，但已

① 《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11 月版，第 85 頁。